

公民黨為外傭爭居權損香港利益

徐庶

公民黨一再挑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挑戰香港的入境條例，一再發動司法覆核，用納稅人的公帑打官司，完全是出於自私自利的動機，置香港整體利益於不顧。這個政黨的性質，完全是外國勢力的代表，決定了他們從成立那天起，就損害香港的長遠利益和繁榮穩定，反對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不斷進行搗亂活動，踐踏香港永久居民的利益。

對基本法斷章取義

公民黨的大狀，知道法院的法官只會從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基本法，然後判案，所以他們就玩弄「捉字蝨」的遊戲，在基本法24條的條文上做文章，條文說外國人「持有有效證件進入香港、在香港通常連續居住七年以上，就可以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所謂連續居住，就是指一年裡面有183天居於香港，但李志喜卻漠視了外傭來港工作的時候，都持勞工簽證入境，本港有法律已明文列出不能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人民入境事務處的權力和入境法律，是誰給的，是基本法第154條賦予的。基本法第154條賦予規定：「對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出境，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實行出入境管制。」勞工簽證的法律效力，列明了外傭沒有永久居權，入境法的權力來源於基本法的授權。公民黨大狀斷章取義，漠視了基本法授予香港入境處和入境法律的權力，製造事端，包攬訴訟自肥，貪婪自私，其心可誅。

公民黨為外傭打官司一箭三鵰

公民黨的前身，是香觀察社，一直鼓吹香港「獨立」。後來，這一群人又和香港大律師公會合流，更加外國「藍血化」，主要成員都持外國國籍或居英權，梁家傑擔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時候，就一再發表了香港應該走向「獨立」的言論。在這個基礎上，他們成立了公民黨，李柱銘成為了公民黨的政治保姆，扶植公民黨的發展和壯大。

公民黨不斷進行司法覆核，既有政治的動機，也有小集團的私利和貪婪。按照他們的計劃，以訴訟挑戰基本法，就是為了迫使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接着他們就在香港製造悲情，說什麼「一國兩制」已死，法治已死，煽動對抗。

至於小集團的利益則是，他們以一班大狀為主力，靠打官司搵食，最易賺的金錢就是包攬訴訟，利用香港法律援助的機制，挑動低收入人士和借用窮人的人頭打官司，一進入司法程序，他們就可以獲得可觀的律師費用，不論官司打勝了還是打輸了，一樣可收錢，荷包腫脹。最近美國人不斷挑動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對着幹，分化亞洲，圍堵和壓制中國的經濟的崛起，香港是支持中國經濟起飛的一個重要的金融商業城市，把香港攪得天翻地覆，成為中國的一個經濟包袱，也符合美國的戰略。公民黨需要大量經費，只要訴訟，就有對抗的業績和表現。他們要申請美國的什麼民主基金經費，爭取捐款，就易過借火了。假如他們的訴訟得逞了，還可以從菲傭身上得到幾十萬選票，不用像其他實幹的政黨那樣，在地區辛辛苦苦做市民服務工作。一箭三鵰，說明了公民黨的狡猾和貪婪。

應加大對中小製造業的扶持力度

羅軍 亞洲製造業協會首席執行官

從匯豐發佈的7月PMI數據來看，中國製造業處在下行區間，而且還可能在三季度內再次下行。可以說，今年國內製造業遭遇了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最大的一次挑戰，而這次挑戰主要來自國內。

但是，國內製造業的緊張局面並非是全國性的，涉及面最廣，形勢最為嚴峻的是廣東、浙江、江蘇、福建等沿海地區。這些地區中小製造業量大面廣，多為勞動密集型、附加值較低的代工企業。

哪些因素導致製造業陷入困境？

目前，國內製造業面臨的情況與2008年有些相似，問題都出在資金鏈上面。不同的是，金融危機導致國外需求減少、歐美市場低迷。而本次危機主要來自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是國家對房地產等過熱行業的嚴厲打擊，僅上半年就採取了2次加息、6次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不少製造業企業授信額度縮水，貸款難，貸款成本增加。據部分金融機構的不完全統計，大概只有20%的中小製造業企業能夠得到金融機構的正常貸款。無形之中導致大量的高利貸等民間非法集資、非法放貸行為發生。而製造業正常的利潤一般在10%左右，今年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利息上浮以後比過去高出4-5倍（其中，還要承擔銀行的很多亂收費）。民間融資成本更是銀行正常利息的10-20倍。這樣下去，即使能夠獲得銀行貸款的企業，負擔也將不堪重負，更不用說高額的民間融資了。

第二、資源和環境的壓力下，轉型和升級使部分中小製造業陷入困境。一部分製造業試圖轉型，但是龐大的投資往往使他們望而卻步，不轉也難，轉也難。

第三、原材料價格和人工工資上漲，導致企業利潤空間收窄。最近幾年，原材料價格一直保持上升狀態，人工工資也是如此。不少地方政府為維護員工利益，強制企業必須確保每年保持一定幅度的漲薪，辦理社會保險。可是，產品價格往往並沒有保持應有的上升空間。

第四、部分製造業企業投機心理作怪，涉足過多行業，造成資金鏈斷裂。做製造業的確非常辛苦，但是房地產等行業卻利潤豐厚，而且週轉周期短，導致不少製造業企業涉足房地產行業。在國家宏觀調控，房市低迷的情況下，企業被拖入困境。

如何為製造業營造良好的政策空間？

國家在嚴格限制房地產等過熱行業發展的同時，信貸政策應該對實體經濟傾斜，決不能擠壓製造業的生存空間。

首先，對製造業企業的授信額度不應該縮水，應該維持在去年的水平，當然為了避免貸款流入房地產等過熱行業，金融機構可以出相應的監管措施；第二、對於製造業的貸款利息應該維持在去年的水平，不應該上浮，更不能與房地產等暴利行業的利息一樣，避免製造業企業的融資成本過度增加；第三、對於科技含量高、有自主知識產權、市場前景好的企業，政府要給予貼息貸款或採取財政補貼的措施。

製造業企業有哪些方面值得反省？

金融危機過後，短短三年時間我們又遭遇了如此嚴峻的宏觀調控，可以說製造業企業一處處在峰頂浪尖之上，隨時都可能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每一次挑戰之後，我們都應該多一些總結和反省。

總體來看，我認為：第一、企業要經得住誘惑，走「專而精」的路子。多元化看起來是非常美好和誘人，但是從國際國內經驗來看，多元化道路上成功的不到10%，絕大部分都會因為這樣那樣的問題而走向失敗；第二、要強化科技創新，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對於廣大製造業來說，科技是立於不敗之地的唯一法寶。科技每天都在創新，有些產品可能一夜之間就會面臨淘汰的風險；第三、企業的擴張要量力而行，不能盲目性再加上隨意性。

製造業企業將迎來哪些機遇？

預計進入第四季度，製造業企業的整體情況將可能發生重大改變，迎來轉機。首先，「十二五」工業轉型升級的發展規劃，「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等一些利好政策將陸續出台，一系列配套資金將使部分企業從中受益；製造業的整體環境將大為改善。第二、預計三季度房地產等過熱行業將有所降溫，宏觀政策的調控力度將適當調整，融資環境有所寬鬆；第四、政府將出台系列政策緩解中小製造業融資難、融資成本高的難題。

讓巴士公司設立燃油附加費

周全浩 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基於燃料價格的波動影響巴士公司盈利，政府可允許巴士公司設立類似兩電的燃料調整費機制，燃料費獨立計算，由乘客承擔。油價上漲時，巴士公司可適當地調高票價，油價下跌時則需減價。設立燃料調整費機制的好處是票價可隨燃料成本的變動而彈性調節，符合用者自付原則，巴士公司不會因燃料價格變動而得到額外的利潤或損失，政府也無需提供額外補貼。

九巴母公司載通發出盈警，指油價及通脹急升，導致成本上漲，預期上半年業績虧蝕。九巴在5月中已加價3.6%，但柴油價格較去年增加4成，加價不能抵銷大幅上漲的成本。加上港鐵的競爭，令收入大減。面對逾六成巴士線虧損，九巴曾考慮削減路線止血，但遭受政府和區議會的阻力，認為會影響基本公共交通服務，造成部分市民的不便。

由政府補貼的票價穩定基金受質疑

九巴另謀對策，向政府提出設立票價穩定基金以補貼油價成本，但遭政府一口拒絕。事實上，票價穩定基金涉及公帑，納稅人需承擔額外的公共交通開支，公眾會質疑政府向私營機構輸送利益。而且，補貼機制運行相當複雜，一旦開了先河，其他交通行業會紛紛仿效，恐防政府應接不暇。

以前，政府為了鼓勵巴士公司投資，允許營利與資產掛鉤，九巴可透過擴大資產或地產項目增加利潤。現在，九巴收入佔載通營業的9成，經營環境越來越困難。港鐵線的覆蓋越來越廣，直接與九巴競爭，巴士變成輔助性交通工具，乘客大減，部分與港鐵重疊的九巴路線於繁忙時段載客量更只有2-4成。

燃料調整費機制符用者自付原則

交通運輸是石油的最大消費行業，近期油價飆升，導致飛機、巴士、的士等運輸服務行業的成本急升，九巴營運雪上加霜。因此，政府有必要檢討巴士公司的定價機制。

基於燃料價格的波動影響巴士公司盈利，筆者提議政府允許巴士公司設立類似兩電的燃料調整費機制，燃料費獨立計算，由乘客承擔。油價上漲時，巴士公司可適當地調高票價，油價下跌時則需減價。誠然，票價不能經常變動，否則市民難以適應。政府可設立機制，根據燃油價格的波幅，票價作適時的檢討及調整。

燃料調整費機制的好處是票價可隨燃料成本的變動而彈性調節，符合用者自付原則，巴士公司不會因燃料價格變動而得到額外的利潤或損失，政府也無需提供額外補貼。

減輕成本巴士仍有競爭力

燃料調整費在交通運輸業並不是新鮮事，航空業早已設有燃油附加費。早前，的士團體也曾促請政府制訂可加可減的燃油附加費機制。筆者認為政府可認真研究這方案的可行性，計劃細節頗複雜，例如每隔多久檢討燃油附加費一次，如何釐定加減幅度等，需小心考慮。

儘管九巴面臨港鐵的嚴峻挑戰，但仍有其優勢和競爭力。巴士能提供點對點服務，有一批忠實的固定搭客，尤其是那些就近巴士站的居民，他們不會長途跋涉走到港鐵站。

巴士仍是香港最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之一，若巴士公司因虧損而大幅削減路線，將造成很多市民的不便。設立燃料調整費機制能緩減上漲的成本，改善巴士公司的營運環境。

增建公屋紓緩市民住屋困難

文滿林 香港國情港事評論社

據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在一個公開場合上透露，今年首季公屋輪候冊上有十五萬之眾，包括六萬多非長者單身人士，當中有百分之四十六是三十歲以下人士。這個數字，除了反映許多時下月入不多的年輕人以單身人士身份去申請入住公屋之外，也反映合乎申請入住公屋資格的個案有急劇增加的趨勢，情況令人關注，希望曾蔭權特首在今年十月的施政報告中以此作為重點解決的施政議題。

輪候公屋人數飆升，從前年只有十一萬多，至今年劇增至十五萬，增幅百分之三十，反映了政府興建公屋追不上基層市民求上樓的需要。政府曾經承諾讓合乎資格的申請人士家庭在輪候兩年就可上樓，並希望在十年之內解決百分之九十基層市民入住公屋問題，將申請公屋個案減至五位數字以下。經過幾年之後，申請入住公屋家庭不但沒有減退，反而增多。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很是值得政府檢討和探究。一、每年計劃興建一萬五千至二萬個公屋單位在目前樓價不斷飆升的形勢下，似乎有種杯水車薪、供不應求之感；二、個人或家庭入息不增反減，令許多單身人士及家庭有機會納入合乎申請入住公屋資格的範疇，加上今年年初政府放寬申請公屋的入息限額，有助一部分「高」入息單身人士及家庭合乎資格轉而申請公屋。尤其是一些月入不超過七千元的年輕人又不想與家人同住，亦陸續加入申請公屋行列，將輪候公屋數字推高，令輪候上樓時間拖長。

人民幣國際化的另類風險

馬建波 百家戰略智庫理事

2010年6月以來，我國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境內試點地區也由上海和廣東省的4個城市，擴大至全國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境外區域則由港澳、東盟地區擴展到所有國家和地區，跨境交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業務擴大至所有經常項下，出口試點企業由試點初期的365家大幅增加到67,724家。由於近年人民幣持續快速升值，在貿易結算中需求殷切。在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省區、企業、規模和境外區域不斷擴大的同時，也正加劇着人民幣的不斷外流和貨幣泡沫化的風險。《2010年中國國際收支報告》指出：自2009年四季度人民幣淨流量從淨流入轉為淨流出3億美元以來，人民幣的淨流出趨勢越來越明顯。至2010年第四季度，人民幣淨流量已達到280億美元，較2009年第四季度增長93倍，全年人民幣淨流出400億美元，已成為影響外匯供求關係的重要因素。

缺乏投資渠道人民幣易被炒作

該報告還顯示，我國人民幣跨境結算以經常帳戶交易項目為主。從2010年人民幣跨境交易數據來看，貨物貿易進口結算所佔比重達71%；貨物貿易出口、服務貿易及其他經常項目結算所佔比重分別為15%和8%。香港是我國內地間人民幣跨境流動最為集中的地區。2010年，亞洲所有國家和地區與我國內地間的人民幣跨境結算量達534億美元，佔人民幣跨境結算總規模的91%。其中，香港與我國內地間的人民幣跨境結算達396億美元，較2009年增長近50倍，佔比升至67%，在所有國家或地區中排名居首。根據香港金管局最新報告顯示：2010年初，香港人民幣存款餘額為600多億，2011年5月底已增加至5,400多億（增幅近9倍），其中7成為企業存款，三成為個人存款。目前，內地人民幣存款總額已達77萬億（2010年GDP總量為39.8萬億人民幣）而香港人民幣存款僅佔0.72%。香港自2007年啟動發行人民幣債券以來，已發行人民幣債券近千億（僅去年16個機構在港發行360億），進一步強化了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債券發行中心的地位。但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考量因素和回籠沉澱人民幣存量的手段之一，目前香港的債

要解決市民的住屋問題，尤其是勞工階層的住屋問題，從目前的走勢看，個人非常認同香港工會聯合會日前提出的一套有關解決住屋問題的建議，即「增加公屋，復建居屋，以私人樓宇作補充」的意見。

只有增建公屋，才能有效紓解輪候入住公屋的上樓時間。否則，只會令輪候公屋的時間越拖越長，從原定的兩年可上樓變成四五年都上不了樓，因為合乎申請資格的比例增長多於每年建屋的單位數字。建議每年從二萬個公屋量增加至每年三萬三或三萬五個單位。以此類推，目前的十五萬個輪候人士大抵可以縮短至二十個月左右便可上樓。可在五年時間內將十五萬個輪候數字減至（剩番）二萬。這是一個較為理想的建屋計劃建議。

增建公屋單位數量，可能會為政府財政方面帶來一些負擔。為省卻這方面的額外負擔，建議政府在公屋的設計及建材配套方面盡量大眾化，不要將公屋建成私人屋苑那麼美輪美奐。近年興建的公屋每每比私人屋苑更「豪華」，所付出的建築費用比之私樓並不遜色，有質變之嫌。從市民大眾來說，或者從申請公屋的人士來說，他們的要求不是這麼高，普普通通就行。安穩居所就是他們最大心願。

對於興建公屋單位面積方面，也是值得檢討的，盡量多建一至三人單位，少建六人以上單位，能滿足一些年輕人及單身長者的申請入住機會，當下的家庭組合與過去不同，以小家庭為主，六人以上家庭已鮮見。多建小單位有助單身人士入住。

市規模距建立中國最大的國際化離岸發債中心仍有較大差距。

須加快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改革

由上可見，人民幣國際化並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在人民幣資本帳戶不能完全開放，境外直接投資管道封閉和擴大境外區域流通存在較大障礙等前提下。人民幣將繼續被美元綁架，人民幣的持續超發和不斷外流，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跨境貿易結算仍同美元主體掛鉤，美元的持續量寬和中國對美元的債務的被迫增持以平衡貿易盈餘，以及現行的強制結售外匯體制，即：結算外匯須強制結售給央行換回人民幣，一方面增加人民幣發行壓力；另一方面又帶來美元外匯儲備繼續增長和貶值的風險。

在人民幣國際化形成機制尚不成熟或形態扭曲的當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激增；而資本項目開放遲緩，人民幣缺少境外投放、沉澱回滙和資產配置的系統機制），勢必加劇全球化的人民幣備兌困境，且在國內也缺少更多投資管道（僅股市和樓市）的情況下，也必將被國際對沖基金所利用，現在美元的濫發已加劇人民幣的「被升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報告表示：「關注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和人民幣幣值被嚴重低估」，這是一個偽命題，中國房地產泡沫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人民幣持續升值的強烈預期和美元輸入性通脹所推動的熱錢避險投資或投機炒作。

因此，筆者認為現時「人民幣幣值不是被嚴重低估」，相反確是可能「被西方過分高估」。可見，一旦人民幣資產泡沫爆發，美元大勢逆轉，而境外人民幣又不能快速形成資產異化，大量人民幣勢必回流國內市場，必將形成人民幣泡沫化和被快速貶值的經濟危機。因此，有關機構應高度重視，必須加快人民幣資本項目的開放改革，繼續擴大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資（ODI）的渠道和規模，同時加快建立香港成為國際化的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和資產配置中心，使香港成為境外人民幣投資、沉澱與回滙循環的橋頭堡，以及化解境外人民幣回滙泡沫衝擊的防火牆。